

春秋
公羊學史

下

曾亦
郭曉東

著

春秋
公羊學史

下

曾亦
郭曉東
著

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春秋公羊學史/曾亦,郭曉東著.

--上海: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2017

ISBN 978-7-5675-5481-8

I. ①春… II. ①曾…②郭… III. ①中國歷史-春秋時代-史籍②《公羊傳》-研究
IV. ①K225.0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(2016)第 157805 號



本書著作權、版式和裝幀設計受世界版權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保護

春秋公羊學史

著者 曾亦 郭曉東

審讀編輯 陳廷燁

責任編輯 倪為國

封面設計 吳元瑛
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 郵編 200062

網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電話 021-60821666

行政傳真 021-62572105

客服電話 021-62865537

門市(郵購)電話 021-62869887

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

網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刷者 上海盛隆印務有限公司

開本 890×1240 1/32

插頁 2

印張 50.5

字數 1020 千字

版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7 年 3 月第 2 次

書號 ISBN 978-7-5675-5481-8/B.1030

定價 198.00 元

出版人 王焯

(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質量問題,請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調換或電話 021-62865537 聯繫)

下 冊

第十三章 劉逢祿：清《公羊》學之大宗

第一節 生平與學述

劉逢祿(1776-1829)，字申受，一字申甫，號思誤居士。江蘇武進人。祖父綸，官至文淵閣大學士、軍機大臣，卒贈太子太傅，諡文定，入祀賢良祠。父召揚，無意仕宦，屢主湖南、陝西、山東講席，課徒授業。外祖莊存與、舅述祖，並以經術名世，逢祿盡傳其學。^①

① 逢祿少穎悟，十一歲時，隨母歸省，存與叩其所讀賈、董文章，乃歎“此外孫必能傳吾學”。然莊與歿於後年，則逢祿似未直接從存與問學，蓋得自其舅述祖也，故《清儒學案》謂其“長聞從舅珍藝(述祖)先生緒論，學益進，盡得其外家之傳”。據承寬《行述》，逢祿先已頗讀董、何之書，時述祖亦欲治《公羊》，而逢祿乃從受《夏時等例》及六書古籀，盡得其傳學，似未言及受《春秋》也。然述祖實以《公羊》治《夏時》，逢祿又自言“從舅氏莊先生治經，始知兩漢古文今文流別”(《跋杜禮部所藏漢石經後》，《劉禮部集》卷9)此皆逢祿之得於述祖也。十九歲時，述祖嘗與語群經家法，大稱善，此蓋逢祿初受學於述祖也。述祖嘗曰：“吾諸甥中，若劉甥可師，若宋甥可友也。”可見述祖對逢祿之欣賞。又據《左氏春秋考證》，逢祿“年十二，讀《左氏春秋》，疑其書法是非多失大義。繼讀《公羊》及董子書，乃恍然於《春秋》非記事之書，不必待《左氏》而明。左氏為戰國時人，故其書終三家分晉，而續經乃劉歆妄作也”，據此，逢祿一生學問大旨，非得於師說，乃幼時獨發神悟，何其早慧若此耶！《行述》謂逢祿“於《詩》、《書》大義及六書小學多出於外家莊氏，《易》、《禮》多出於臯文張氏，至《春秋》，則獨抱遺經，自發神悟”，則誠是也。

又，道光八年，莊綬甲刊刻存與《易說》，董士錫讀其書，撰序云：“劉逢祿作《公羊釋例》，精密無耦，以為其源自先生。”十七年，李兆洛撰《珍藝宦遺書序》，謂“申受所著《公羊》，多本宗伯(存與)”。是說與《行述》不合。

逢祿貌不逾中人，而容止溫肅，吐囑謙謹。幼好學，十三歲，“十三經及周秦古籍皆畢”。嘗讀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而慕之，乃求得《春秋繁露》，益知爲七十子微言大義，遂發憤研讀《公羊傳何氏解詁》，不數月，盡通其條例。

逢祿舉業頗不順，屢困場屋，至嘉慶十九年（1814），年三十九，始成進士，選翰林院庶起士，改禮部主事。道光四年（1824），補儀制司主事。據其子承寬《先府君行述》，逢祿在禮部爲官十二年，常“據古禮以定今制，推經義以決疑難”，非徒簿書期會如胥吏所識而已。嘉慶二十五年，帝崩，逢祿撰《庚辰大禮記注長編》十二卷，典章備具，體例謹嚴。道光四年，越南貢使陳請爲其國王母乞人參，而諭中有“外夷貢道”之語，其使臣欲請改爲“外藩”，逢祿爲牒復之曰：“案《周官·大司馬·職方氏》，王畿之外分九服，夷服去王國七千里，藩服去王國九千，是藩遠而夷近也。又許氏《說文》謂羌狄蠻貊字皆從物旁，惟夷從大從弓者，東方大人之國，夷俗仁，仁者壽，有東方不死之國，故孔子欲居之。且乾隆間奉上諭申飭四庫館，不得改書籍中‘夷’字作‘彝’、‘裔’字。舜東夷之人，文王西夷之人，我朝六合一家，盡去漢唐以來拘忌嫌疑之陋，使者無得以此爲疑。”遂無辭而退。《行述》因稱逢祿“據經決事，有先漢董相風”^①，可謂能通經而致諸實用者也。

逢祿治《春秋》，通大義而不專章句。據《公羊解詁箋》，逢祿嘗曰：“世之言經者，於先漢則古《詩》毛氏，後漢則今《易》虞氏，文

① 李兆洛《禮部劉君傳》謂逢祿“在官，凡同列有疑不能決者，爲引經義別白之。已而公卿亦多就問所疑，無不據經決事，有董相風”。戴望《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劉先生行狀》則云：“先生進退中禮，言動皆有則望，其容止夷然退然，嘗欲推舉古制，見諸行事，咸怪笑爲迂，不以措意”。《清史列傳》亦稱逢祿“在禮部十二年，恒以經義決疑事，爲眾所欽服”。凡此，皆本《行述》之說也。然劉師培《清儒得失論》詆之曰：“議禮斷獄，比傳經誼，上炫達僚，旁招眾譽，然此特巧宦之捷途，其枉道依合，信乎賈、董之罪人矣。”其實，漢人素有經義決事之風，觀董仲舒《決獄》與何休《漢議》可見矣，師培可謂信口雌黃而已。

詞稍爲完具。然毛公詳古訓而略微言，虞翻精象變而罕大義，求其知類通達、微顯闡幽者，則《公羊》在先漢有董生、後漢有何邵公氏、子夏《喪服傳》有鄭康成氏而已。先漢之學，務乎大體，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也。後漢條理精密，要以何邵公、鄭康成氏爲宗，然喪服於五禮特其一端。《春秋》文成數萬，其旨數千，天道浹，人事備，以之貫群經，無往不得其原；以之斷史，可以決天下之疑；以之持身治世，則先王之道可復也。”又據《行述》，逢祿於是尋其條貫，正其統紀，爲《公羊春秋何氏釋例》三十篇；又析其疑滯，強其守衛，爲《公羊解詁箋》一卷、《答難》二卷。又推原穀梁氏、左氏之得失，爲《申何難鄭》四卷；又博徵諸史刑、禮之不中者，爲《禮議決獄》四卷；又推其意爲《論語述何》、《中庸崇禮論》、《夏時經傳箋》、《漢紀述例》各一卷；其雜涉蔓衍者，尚有《緯略》一卷、《春秋賞罰格》二卷。凡十有一種。^① 逢祿又閱時學者說《春秋》皆襲宋儒“直書其事，不煩褒貶”之辭，獨孔廣森爲《公羊通義》能抉其蔽，然尚不能信“三科九旨”爲微言大義所在，乃著《春秋論》上、下篇以張聖權。又成《左氏春秋考證》二卷，知者謂與閻、惠之辯《古文尚書》等。

逢祿又以東漢經師有家法可尋者，今惟何、虞、許、鄭四君子。虞氏之《易》，雖惠、張創通大義，學者罕得其門而入，因別爲《易象賦》、《卦氣頌》、《易言補》、《虞氏變動表》、《六爻發揮旁通表》、《彖象觀變表》、《卦象陰陽大義》、《虞氏卦象觀變表》各一卷。鄭氏於三禮外，於《易》、《詩》非顯門，其《尚書注》已亡，乃掇拾殘闕，兼蒐眾說，爲《今古文尚書集解》三十卷、《書序述聞》一卷。許氏《說文》爲形書，而古韻未有專籍，乃研極精微，分爲二十六部，每部先收《毛詩》字，次《說文》，次《廣韻》，每字復推其本旨，詳其

^① 《行述》載諸書卷數與逢祿《釋例》敘所言不盡同，據《釋例》敘，有《禮議決獄》二卷、《申何難鄭》五卷，稍有不同。

訓詁，爲《詩聲衍》二十七卷、《條例》一卷。又欲爲《五經考異》，仿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例，以存異文古訓，先成《易》一卷、《春秋》一卷。又取《史記·天官書》及《甘石星經》爲之《疏證》二卷。其他所著，有《毛詩譜》三卷、《詩說》二卷、《石渠禮議》一卷、《庚辰大禮記注長編》十二卷、《春闈雜錄》一卷、《東陵勘地圖說》一卷。又編輯《八代文苑》四十卷、《唐詩選》四十卷、《絕妙好詞》二十卷、《詞雅》四卷。所著詩文，有《劉禮部集》十二卷。^①

道光九年(1829)八月，逢祿卒於京師。是年九月，《皇清經解》輯刻成書，收錄其《公羊何氏釋例》十卷、《公羊何氏解詁》一卷、《發墨守評》一卷、《穀梁廢疾申何》二卷、《左氏春秋考證》二卷、《箴膏肓評》一卷、《論語述何》二卷，凡七種。^②十年五月，承寬屬魏源、龔自珍、凌堃、陳潮校定逢祿遺集，魏源論定逢祿遺書，題曰《劉禮部集》，凡十二卷。1923年，武進西營劉氏十九世孫劉祺編纂《武進西營劉氏清芬錄》第一集，其中收錄逢祿之大部分著作，而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十卷、《釋例後錄》六卷、《論語述何》二卷等《春秋》學著作俱在其中。

逢祿之學，頗受時人推崇。阮元刊刻《皇清經解》，頗收錄逢祿之書。同邑李光洛(字申耆)，與逢祿齊名，號“常州二申”，嘗撰《禮部劉君傳》，謂“君雖未肯抗行仲舒，以視羸公，固有餘矣”。魏源《劉禮部集》敘則推崇逢祿超乾嘉考據前賢，以進於西漢微言大

① 參見徐世昌：《清儒學案》卷75。

② 案，道光四年，李兆洛嘗在暨陽校《釋例》一書。又據劉祺輯《西營劉氏清芬錄·文稿內篇》，《釋例後錄》六卷中，“《公羊申墨守》、《廣墨守》各一卷，原名《公羊解詁箋》，即禮部總序《箋》一卷、《答難》二卷是也；《廣墨守》十七條以下原稿缺佚，魏氏源取禮部《公羊通義條記》補之；其《申膏肓》、《廣膏肓》、《申廢疾》、《廣廢疾》各一卷，即總序《申何難鄭》四卷是也；《廣膏肓》原名《春秋左氏考證》。李氏共厘爲六卷，總名爲《釋例後編》”。據此，《後錄》包括由《公羊解詁箋》改題的《公羊申墨守》，由《答難》與《公羊通義條記》(此爲對孔廣森《春秋公羊通義》的箋釋)合成的《公羊廣墨守》，由《左氏春秋考證》改題的《左氏廣膏肓》，由《穀梁廢疾申何》改題的《申穀梁廢疾》與《穀梁廣廢疾》，由《箴膏肓評》改題的《左氏申膏肓》。

義。又，《行述》謂逢祿治學異於世儒，蓋能“求公是而祛門戶”也，然今、古之爭實因逢祿而起。其後，清人於逢祿之學，或褒或貶，皆泰半出於門戶之見也。如劉文淇雖治《左氏》，然以舅氏凌曙及聞人陳立故，猶能平心以論逢祿之學，其為陳立《句溪雜著》撰序，謂逢祿“謹守何氏之說，詳義例而略典禮”，可謂公允之論。若沈欽韓則徑謂凌曙“為劉逢祿輩所誤，溺於《公羊》”。

若戴望師宋翔鳳，未及見逢祿，然深慕其學，乃撰《行狀》，曰：

自公羊先師邵公而後，聖經賢傳蔽錮二千年，徐彥、般侑、陸佃、家鉉翁、黃道周、王正中咸相望數百載，雖略窺指趣，未能昭揭。迨所聞世，莊侍郎、孔檢討起而張之，至於先生，干城禦侮，其道大光，使董、何之緒出而復明，殆聖牖其衷，資瞽者以詔相哉？^①

其時，李慈銘《越縵堂讀書記》頗論逢祿之書，以為“說禮論學，皆推本《公羊》及何氏，精覈博辨，自為顯家”，“著書至十餘種，皆深造有得，精深博大，不專事章句，可謂經緯典謨，不與守文同說者”，此其褒也；又謂“過尊邵公，上自《左氏》、《穀梁》，下汙許、鄭諸儒，皆致攻駁，是其所蔽”，且稱“閱劉申受集，其才力足雄一時，而學術不足法”，“申受知讀舊鈔本《北堂書鈔》，而不知讀注疏，自來郢書燕說，無如是之可笑者”，則又貶至如此。

又有周中孚《鄭堂讀書記》，頗不以《釋例》為然，以為“不過數月可畢事”之書，又謂其敘“可笑其不自量”；^②至《論語述何》，以為“不免穿鑿附會”，“非經之本旨”。^③

更後，陳澧《東塾讀書記》出，其中詳論逢祿之失，如駁其“《左

① 戴望：《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劉先生行狀》，《謫磨堂遺集》文一，光緒元年刊本。

② 周中孚：《鄭堂讀書記》卷 11。

③ 周中孚：《鄭堂讀書記》卷 13。

氏》不傳《春秋》”、“新周”說、釋“惠公仲子”、《左傳》附益之類。

然此數人者，雖博極群書，實未為《春秋》顯家，亦不必深引以為信據也。至清季，康長素挾經術以論政事，始則行君憲以變清政，繼則倡保皇以遏革黨，終則守君主而傷共和，故朝野之攻康氏者，遂因以讎逢祿之學矣。

先是朱一新謂《左氏春秋考證》“多專輒之詞，深文周內”^①，又不憚其《論語述何》，以為“申受於邵公所不敢言者，毅然言之，卮辭日出，流弊甚大。《公羊》與《論語》初不相涉，而作《論語述何》以溝通之”^②，至稱逢祿“析言破律，亂名改作，聖人復起，恐皆不免於兩觀之誅”^③。又有葉德輝，痛於戊戌之禍，論逢祿“以門戶太過，斥班偽《左》，禍成於墨守，害切於坑灰”，蓋比於始皇之焚書坑儒也。

其後，章太炎極攻逢祿之說，其所撰《春秋》諸書，俱以詆康駁劉為事矣。其初，太炎尚稱逢祿“始專主董生、李育，為《公羊釋例》，屬辭比事，類列彰較，亦不欲苟為恢詭。然其辭義溫厚，能使覽者說繹”^④，猶重其學也。又謂“劉逢祿以《公羊傳》佞諛滿洲。大同之說興，而漢虜無畔界”^⑤，可謂誅心刻深之辭也。至於稱“《公羊春秋》之學，近世甄明之者，自劉逢祿。逢祿祖綸，仕滿洲為執政，家世受豢，忘其宗國，橫取《公羊》言進吳、楚者，以傅會引弓之帝”^⑥，此說猶唯物論者之階級分析法，蓋以立場而論是非也。

又有劉師培者，蓋文淇曾孫也。師培雖祖革黨，然以四世家學之故，為論能實事求是，較少太炎門戶之見也。雖然，猶謂常州學

① 朱一新：《答康長孺書》，載張榮華：《康有為往來書信集》，第99頁。

② 同上，第100頁。

③ 朱一新：《復長孺第四書》，載張榮華：《康有為往來書信集》，第107頁。

④ 章太炎：《檢論·清儒》，《章太炎全集》第三，第476頁。

⑤ 章太炎：《檢論·學隱》，《章太炎全集》第三，第481頁。

⑥ 章太炎：《與劉揆一書》，《章太炎全集》第四，第187頁。

者“擇術則至高，而成書則至易，外託致用之名，中蹈揣摩之習，經術支離，以茲爲甚”^①，亦門戶之辭耳。

迄自辛亥鼎革，經學既衰，今古之爭亦漸息矣，此後學者稍能持公允態度，平議逢祿之學矣。

1920年，梁啟超撰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稱逢祿《釋例》以科學方法歸納何休《解詁》條例，又謂《左氏春秋考證》具有辨偽之成就。1931年，錢玄同撰《左氏春秋考證書後》，稱《考證》乃百年來辨偽學運動之先驅，其價值可與閻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相埒。凡此，皆肯定逢祿在思想史上之貢獻。

至1936年，錢穆出版《國學概論》，謂逢祿“徒知株守何氏一家之說”，又謂“其篤信師傅，守家法，爲吳學嫡傳。其以條例求經，則帶皖學色彩。其不願爲章句訓詁而務大體，則章、方諸人攻擊漢學之影響也”。^② 1937年，錢穆又出版《中國近三百學術史》，其中謂逢祿“論學主家法，此蘇州惠氏之風也；主條例，則徽州戴氏之說；又主微言大義，撥亂反正，則承其外家之傳緒。值時運世風之變，而治經之業乃折而萃於《春秋》，治《春秋》又折而趨於《公羊》焉”。^③ 1940年，孫海波撰《莊方耕學記》，稱逢祿“始專主家法，創條例，重新何氏一家之言，夫而後今文之學，壁壘始森嚴”^④。1952年，牟潤孫撰《春秋左傳辨疑》，頗駁逢祿之說，以爲所論乃“任情妄說”。凡此，皆從經學立場平議逢祿之書，而較少意氣之苛論矣。

① 劉師培：《近代漢學變遷論》，《劉申叔先生遺書·左盦外集》。

② 錢穆：《國學概論》第九章。

③ 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下冊，第585頁。

④ 載存粹學社編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論集》，香港崇文書局，1971年。

第二節 何休“三闕”與劉氏“申何難鄭”

東漢以降，今學勢衰，古學寢盛，如賈逵輩藉帝王佑護，緣隙奮筆，幾奪《公羊》。今學雖微，然先有李育，“以《公羊》義難賈逵，往返皆有理證”，後有何休，與其師博士羊弼，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，作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穀梁廢疾》。晉人王嘉在《拾遺記》中謂三書為“三闕”，蓋以其“言理幽微，非知機藏往，不可通焉”。^① 其後，鄭玄就此撰《發墨守》、《箴膏肓》、《起廢疾》三書。休見而歎曰：“康成人吾室，操吾矛，以伐我乎！”不過，據現有史籍，何休未再致辯，而是轉而精治《公羊》，完成其《春秋公羊解詁》。

後人多據何休之歎語，以為何、鄭之爭論，似乎鄭玄稍占上風。然而，何休固據《公羊》以攻二傳，至於鄭玄駁“三闕”，則未知所據也，更遑論何、鄭爭論之細節。直至嘉慶元年（1796），逢祿年二十一，乃撰《穀梁廢疾申何》，始就何、鄭之爭論重新進行了反省，且謂何休“入室操戈”語，不過“宏獎之風”而已。

《穀梁廢疾申何》一書，《清經解》作兩卷，而《後錄》分別作《穀梁申廢疾》與《廣廢疾》，各一卷。上卷凡四十條，僅四條乃輯得鄭玄《起廢疾》語，附於卷末；其餘三十六條，或錄經文，或錄《穀梁》傳文，其下皆附何休《穀梁廢疾》與范氏所釋，更下則有逢祿之難辭，以明其“難鄭”之意。下卷凡一百五十一條，皆節引《穀梁》傳文，皆《廢疾》所不具，自為摘出而申之，間及范注，後則為逢祿之申辭，而以“申何”為旨。周中孚謂是書“仍以《公羊》家言作禽墨之守禦耳”^②，而楊鐘羲則曰：“逢祿護持任城，作禽息之守禦，排

① 王先謙：《後漢書集解》引。

② 周中孚：《鄭堂讀書記》卷11。

斥《左》、《穀》，大放厥詞，自謂非敢黨同，不可信矣。”^①

逢祿敘云：

竊嘗以爲，《春秋》微言大義，《魯論》諸子皆得聞之，而子游、子思、孟子著其綱，其不可顯言者，屬子夏口授之，公羊氏五傳始著竹帛者也。然向微溫城董君、齊胡毋生及任城何劭公三君子，同道相繼，則《禮運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所述聖人之志、王者之跡，或幾乎息矣。穀梁子不傳建五始、通三統、張三世、異外內諸大旨，蓋其始即夫子所云“中人以下不可語上”者，而其日月之例、災變之說、進退予奪之法，多有出入，固無足怪。玩經文，存典禮，足爲公羊氏拾遺補闕，十不得二三焉。其辭同而不推其類焉者，又何足算也。兼之經本錯迕，俗師附益，起應失指，條列乖舛，信如何氏所名“廢疾”，有不可強起者。

逢祿以《春秋》有微言大義，其大綱猶見於子游、子思與孟子書，即《禮運》、《中庸》與《孟子》也。若《春秋》有不可顯言者，則自子夏以下，由公羊氏世傳之。若《穀梁》者，則不傳建五始、通三統、張三世、異外內之旨，即何休之“三科九旨”，此殆《春秋》之“不可顯言者”；至於日月例、災變說與褒貶之法，雖與《公羊》同，然“多有出入”耳。

敘中又謂“《穀梁》不傳託王諸例，非微言口授，故可先著錄也”，據此，則《穀梁》能明大義而不傳微言，其著竹帛，在戰國之末，而先於《公羊》也。

觀逢祿之敘，其撰此書，蓋以《穀梁》雖與《公羊》有出入，然猶得爲《公羊》“拾遺補闕”，故“採擇美善”而爲是書耳。可見，逢祿

^① 《續四庫提要·穀梁廢疾申何》。

此時雖有禽墨之意，然實有折衷三傳之實耳。其後，劉氏撰《解詁箋》與《左氏春秋考證》，皆明二傳能為《公羊》補闕之意，此種立場極明顯，無怪乎陳立《公羊義疏》謂逢祿“自亂家法”也。

逢祿以《穀梁》補《公羊》之闕，然畢竟以《公羊》為主，其旨則在“申何”也。不過，較諸《穀梁廢疾申何》，逢祿後來又撰《公羊解詁箋》，此書對於《穀梁》乃至《左氏》之吸取，其實走得更遠。譬如，關於隱元年“惠公仲子”一條，逢祿前後的解釋就非常不同。

《公羊》：仲子者何？桓之母也。

《穀梁》：仲子者何？惠公之母、孝公之妾也。

至於《左氏》之說，如杜預謂“仲子者，桓公之母”，蓋從《公羊》說也。然鄭玄與何休辯，於此不取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，而採《穀梁》說，曰：“若仲子是桓公之母，桓未為君，則是惠公之妾，天王何以贈之，則惠公之母亦為仲子也。”不過，鄭玄似不盡反對《公羊》說，僅以為惠公妾、孝公妾皆得稱仲子也。逢祿此時尚以“申何”為主，故曰：“隱為桓立，故以桓母之喪赴於王，《春秋》因之以成公意爾。”然至《解詁箋》、《左氏春秋考證》，逢祿竟以《穀梁》說為得之矣。可見，逢祿後來更有“折衷三傳”的傾向。

《穀梁廢疾申何》乃逢祿最早的《公羊》著述，此後，陳立撰《公羊義疏》，則專以“申何”為旨，而於此書多有辨駁。

其後，皮錫瑞《春秋通論》云：

何休《墨守》僅存一二，《廢疾》得失互見，《膏肓》以左氏所載之文，為《左氏》之罪，未知國史據事直書之例，且駁論多瑣細，惟兵諫娶數條，於大義有關。鄭《發墨守》，亦僅存一二，《起廢疾》亦得失互見，《箴膏肓》多強說，以文公喪娶為權制，豈有喪娶可以從權者乎？

可見，皮氏雖宗《公羊》，然於何、鄭之爭，則不作左右袒，而以雙方俱有得失也。

第三節 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

據張廣慶《年譜》，乾隆五十五年(1790)，逢祿時年十五，已治《公羊》條例之學。^①嘉慶十年(1805)，逢祿年三十，時主兗州講席，於東魯講舍撰成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，凡十卷三十篇。^②

《釋例》一書，蓋以纂輯胡毋生《春秋條例》為事也。嘉慶十年(1805)，申受於東魯講舍作雜述詩八首，其間有自注云：

余少喜讀《蕃露》，既冠，纂輯胡毋子都《春秋條例》、《春秋禮》、《申何難鄭》諸書，一輟於應試，再輟於遭故，尚未畢業。^③

至《釋例》成，逢祿又有詩云：

一月重尋翰墨緣，溫城絕業得珠聯。(自注：《南宋館閣書目》謂：蕃露，冕之所重，有聯貫之象。《春秋》比事屬辭，立名或取諸此。時纂輯《春秋條例》方竟。)窺園未免慚前哲，駐

① 案，逢祿《尚書今古文集解》序自謂“予自束髮治《春秋》”，又有詩“書擬溫城失貫城”(《劉禮部集》卷11)，自注云：“余少喜讀《蕃露》，既冠，纂輯胡毋子都《春秋條例》。”則逢祿既冠後始治《春秋》也。然《解詁箋》云：“余自童子時，癖嗜二君之書，若出天性。”二君者，乃董、何也，則逢祿治《春秋》，則在童子時也。

② 是書敘云：“故尋其條貫，正其統紀，為《釋例》三十篇；又析其凝滯，強其守衛，為《箋》一卷、《答難》一卷；又博徵諸名刑禮之不中者，為《禮議決獄》一卷；又推原左氏、穀梁氏之失，為《申何難鄭》五卷。”《年譜》以為，敘中所言諸書，“不過草稿粗就，其後或有易稿增刪”，正式成書多在《釋例》之後，故以各書敘文所署年月為準。

③ 《劉禮部集》卷11。

景方知絕幾編。(自注：撰此書凡三易稿。)天遺幽人在空谷，
帝爲詞客展華年。擬將中壽安吾份，半世須教萬古傳。^①

可見，《釋例》一書，名爲申何，實纂輯胡毋生《春秋條例》也。至《釋例》書成，亦本以《春秋條例》名其書也。

對此，張廣慶《年譜》云：

胡毋子都嘗自作《條例》，何休略依之以通《公羊傳》義，
多得其正。先生蓋以爲何氏義既遠紹胡毋氏，則纂輯《春秋
公羊解詁》義例，胡毋生之《條例》可得而見焉。惟書成之後，
則題曰《何氏釋例》，以不復以胡毋生《條例》爲名。^②

案，《釋例》敘既謂何休“尋董、胡之緒”，又謂“董生、何氏之書
若合符節”，可見，此時逢祿猶以“溫城董君、齊胡毋生及任城何邵
公三君子同道相繼”^③，是則其志雖在纂輯胡毋生《條例》，卻以
“何氏釋例”名其書，又謂“溫城絕業得珠聯”，則《釋例》實亦宗
胡、董也。然觀晚清公羊學之發展，董、何之學實有異同，是以逢祿
之《釋例》，可謂“孤緒微茫接董生”也^④。

其敘又云：

大清之有天下百年，開獻書之路，招文學之士，以表章六
經爲首。於是人恥鄉壁虛造，競守漢師家法，若元和惠棟氏之
於《易》、歙金榜氏之於《禮》，其善學者也。祿束髮受經，善董

① 《劉禮部集》卷 11，《閏六月三十重度時〈春秋釋例〉成題四章示諸生》。

② 張廣慶：《武進劉逢祿年譜》，第 53 頁。

③ 劉逢祿：《穀梁廢疾申何》序。

④ 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二十二，載朱維錚校注：《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》，第 61 頁。